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十四輯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

第十四輯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中華叢書 宋史研究集第十四輯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印行

編輯者 宋 史 座 談 會

編印者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發行者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號

電話：三二一六一七一

全一冊 基價
精裝新台幣伍元叁角
平裝新台幣肆元叁角

編輯小啓

宋史研究集第十二輯的稿子交出以後，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負責人希望本座談會能繼續編下去。經過本會的編輯同仁會商的結果，接受他們的建議，乃又簽訂了第十三、四兩輯的合約。

宋史座談會是我國研究宋、遼、金、西夏、元史學者的自動組合，以相互交換研究心得爲主旨。今日國際間研究宋、遼、金、西夏、元史的風氣很盛，日本有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會的組織，由青山定雄教授主持，定期出版油印本「宋史研究文獻速報」。美國有宋元史研究專刊 (Bulletin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 的出版，由康奈爾大學歷史系彼德森 (Charles A. Peterson) 教授主其事。歐洲方面過去由白樂日 (Etienne Balazs) 領導的宋史研究計畫，雖早已結束，然西德慕尼黑大學傅海波 (Herbert Franke) 教授編的宋代名人傳 (Sung Biographies) 已於一九七六年在德國出版，法國巴黎大學吳德明 (Yves Hervouet) 教授編的宋代書錄 (A Sung Bibliography) 於一九七八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出版。我們爲了與各國的研究機構或個人互通聲氣，這宋史研究集的出版是有其必要的。

第十四輯收有論文十四篇，包括宋、遼、金、元的思想、史學、政治、經濟、財政、軍事、人物以及書誌等，都三十七萬言。希望國內外同道多予指教。

宋史研究集
第十四輯

二

宋史座談會宋史研究集編輯小組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二日

宋史研究集 第十四輯 目錄

編輯小啓

金代與南宋在思想史上的再估價

劉子健著
陳信雄譯 一

南宋浙東的史學

宋 晞 九

北宋科舉制度研究續（下）——進士諸科之解省試法（下）

金中樞 五三

元代科舉制度

楊樹藩 一九一

宋代監牧

林瑞翰 二二一

宋樞密院與宋國勢之關係

梁天錫 二三七

北宋對西夏的和市馭邊政策

廖隆盛 二四七

補宋史周麟之傳——兼論宋史中的缺傳

王德毅 二八一

我國飲茶成風之原因及其對唐宋社會與官府之影響

朱重聖 三一五

契丹二元政制與元魏之關係

趙振績 四一三

南宋的農產市場與價格

梁庚堯 四二七

略論南宋時代的歸正人

黃寬重 四七五

石湖紀行三錄考

程光裕 五一九

宋史研究集 第十四輯

二

南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大奚山（今香港大嶼山）島民作亂始末考……………曾一民：五二七

金代與南宋在思想史上的再估價

劉子健作
陳信雄譯

如何深切了解蒙古統治的中國，首先要了解女真（金）的背景，其次要明瞭南宋的背景是同等重要的。此種見解既切要又實際，却未曾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著眼於此，探討元代思想史。筆者不擬也無需引經據典作長篇累牘的討論，凡所論述皆可印證於各種相關圖書。重點不在於資料之獲致，而在於能否將史料賦以應有之意義。

爲闡明理路，首先概述幾項制度之特徵，以說明上述的見解，並申論一個信念——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探討相關的史實。

例如省制，許多書上都認定它始於元之「行中書省」。行中書省乃建於地方之「派遣分省」或「中書省派遣分部」，就如目前軍事上或軍政府的術語——戰地行轅。其實這項制度早在金代就加以擬議，並付諸實施，蒙古人只是承襲。因為蒙古人欲效金人之地方分權，而不喜宋人之中央集權。

又如元代士大夫的地位大爲低落，衙門屬吏擢昇爲掌權之官僚。這種情況在金代雖被視爲離經叛道，却早已存在，只是較爲和緩而已。

說到這裏就牽涉到一個問題——金代的學術思想如何？這個論題素來在證據和論調兩方面是互相矛盾的。殘存至今的金代著作，尤其金代晚期學者的著述以及金廷檔案殘篇所輯的金史，大體說

來水準似乎很高，然而後代對金代學術總是貶抑。這點實在相當費解。

我們應當完全撇開明、清人的偏見。明人新從蒙古手中奪回江山，民族意識強烈，亟力排斥異族，於金亦不例外。清代滿洲人崛起之初號稱後金，以金之後自居，然而不久以後再也不願提起這脈血緣，好像只要一提起就會玷污他們所期許的漢化。滿洲人處心積慮要擔當中華文化最偉大的保護者；所以網羅豐富的四庫全書獨於金代著作少做收錄。

清代民間學者又另有偏見。例如宋元學案，宋元思想史的經典之作，只要稍微翻閱此書就會覺得金好像不曾存在過，而那時期的北方也不會出現一個值得提起的第一流學者。這是爲了把朱熹學派捧爲理學正宗而歪曲史實。甚至於其他主要學派，例如很明顯與朱熹持敵對的陸九淵，或經世學者如葉適等人，也同樣蒙蔽不察。此外，另有地域性的偏見。黃宗羲和全祖望先後踵繼，爲浙東學派的兩位史學宗師，著述豐碩，此學派中人對過去迄至當時的北方學術素無善評。

撇開偏見，吾人不能不正視思想發展的地域性因素，不能不設身處地站在金人的地域性立場來重估其學術地位。在北宋，黃河流域的學術思想頗爲傳統而保守。相較之下，長江流域方面顯得相當活邁——經濟方面則幾個新興的經濟中心各有其空前成就，學術思想方面則突破儒家傳統，多所創見，世人稱之曰新儒學。

北宋五子是很好的例證。他們出自北方，但他們的聲譽是後來南方朱熹學派給追溯而宣揚的。就典籍考察，他們並不像朱熹輩所渲染的那麼偉大。當其生時，名聲遠不如一般人熟悉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等南方名士。北宋五子也沒有南方學士的縱橫才氣，以一人之身而兼

能詩、能文、知史，且能爲古籍注疏。他們身後在長江流域雖有聲名，但其學說未見發展，金代學界另有所重。

在北宋五子中程氏兄弟的時代裏，司馬光應該是北方學界的泰斗。他跟許多南方學士一樣，具有多方面的才藝——深悟心性之學，有貢獻於禮教和家庭規範，在史學上的成就，更使他幾乎與同宗（司馬）的漢代太史公等量齊觀。然而，他具有創作才華，却一直謹守傳統不喜作突破性的創作。

筆者發現重估金代學術思想的一項方法是將金代學術與其同地區的前代思想做一比較。乃做抽樣試驗，先選取部分司馬光的著作，再從許多金代作品中挑出與前者題目相同或相類的作品，而後將二者混雜在一起，隱其出處。隔一段時日，再取出以分辨各文原來所屬，筆者發現它們相似得難以區分。此一試驗配合其他證據，顯示金代學者實質上承襲了北宋黃河流域的學術思想遺產，明清兩代對他們的估價實在偏低。

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認金代學術無法與南宋相提並論，正好像金的經濟和都市發展大體上不如南宋，而其出版和書籍買賣更不如南宋。這個估計最能解釋金代學術思想的現象——南宋理學鼎盛如日中天，高麗與日本亦羣起仿效，唯獨金代學者罕見涉及。金代學者並沒有什麼成見，他們低微的社會政治地位並沒有使他們保守而拒受新思潮。似乎他們謹守北宋學風，以至無法欣賞南方的新與學術，也因此罕見參與。如果他們接觸到南方學術的嶄新面貌，一定會驚訝而困惑。

要確切地重估金代思想，只能以北宋學術的標準來衡量，不能以南宋爲尺度。再者，如果以爲

金代學者保守成性則必乏創見，亦與事實不符。金代學者至少在相當程度之內有其創見，只是其發展途徑有異於南宋，不重儒術而偏於宗教。在異族統治下，金代學者爲了自保而摻和儒術與道教，創立全真教。金之全真教廣受歡迎，於社會福祉和世道人心多所貢獻，宏揚儒術功不可沒。金代學者於其所信仰與所致力，用心專且深，爲南宋朱熹等人所不及，故其成就如斯其鉅。此爲金代學者過人之處。設若金代學者將此宗教之誠轉而致力於儒術，相信其成就不會比南宋人差多少。

蒙古人入主華北時所接觸的當地學術風氣便是上述金代風尚。對蒙古人有影響力或可能影響蒙古人的人，如耶律楚材、劉秉忠、劉因等，都不純是儒家。他們是金代學者，融道家和儒家思想於一身。而於儒、道二者，蒙古人近道而遠儒，他們亦司空見慣。在另一方面，如元好問者以儒者自許，亟思維繫北宋儒術於不墜，則不見重於蒙人。

在政治措施方面，少數具有影響力的北方學者建議將儒家學說用於實際行政。這項建議符合了蒙古人注重實際的心態而得實現。此種元初政情引發了一門新興的學問——吏學。此種研究使一些有關的儒家學說得以付之實現，但除此而外，儒家學說並未受到重視。

關於南宋背景，蒙古人之所以唾棄南宋學者與儒仕所標榜的高聳入雲的價值標準，決非因爲他們野蠻不化。南宋忠臣、儒仕、學者的行徑可以給我們一點啓發——南宋的結局是隨著儒仕和儒將的隱退而亡國的。

蒙古人滅亡南宋以前，將近四十年，在北方農村社會以金代模式維持一個相當穩定的政府。此時，他們沒有理由變更制度，也無需向敗亡的南宋學習什麼。

在征服者蒙古人看來，對宋廷官員究竟作何種評價呢？貞節烈士如文天祥臨死不屈，如其他將士視死如歸者，其收錄於宋史忠義傳的，總數不過數百人，只是南宋官員中微乎其微的小數目。而且這個數目之「大」還是空前的，北宋亡國時的殉國烈士人數更少。在另一方面，如果能有同樣周詳的記錄，金朝崩潰時的殉國之士是否就比南宋短少，吾人不能無疑。文獻不足徵，存而不論。

南宋政府的離心失德，尤其使蒙古人相信南宋官員和將領在失敗之後，必會投降或退隱。事實上，正是越來越多的投降者給蒙古人鋪上了勝利的大道。劉整的事例最具關鍵性，也最能說明上述的現象。因為一般書籍多未著重劉整其事，茲將其經緯概述一二。

南宋賈似道爲相數十載，直到景定元年（一二六〇）均賴劉整籌謀戰備。翌年劉降敵，爲蒙古提供情報，南宋戰防之重點和弱處暴露無遺。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劉整建議蒙古以貿易代替戰爭來削弱湖北襄陽的戰略防禦，不出劉氏所料，守將呂文德爲了財利竟然與敵貿易。咸淳四年（一二六八）劉整力主興建水師，因而奠定了打敗南宋的基石。咸淳九年（一二七三）劉整參與襄陽之役。南宋朝廷深知劉整的危險性，乃透過一位和尚，送出假情報，僞稱將迎回劉氏而封之爲侯，希望蒙古人截獲此情報而不再信任於劉整。這個不高明的手法沒能奏效，守將呂文煥降，襄陽陷。在咸淳十年（一二七四）、德祐元年（一二七五）的淮水之役，劉整和呂文煥均極力召降南宋的地方官吏和水、陸將領。德祐元年劉整逝世，賈似道爲之釋然，但呂文煥繼續召降宋臣，傾心瓦解宋室，不遺餘力。

未幾，留夢炎之流，權位之重不下於宰輔，却與朝廷反目。其他高官重臣多有棄職潛逃者。如

陳宜中託言求援於安南，一去不復返。如王應麟，身兼重臣和理學大儒之尊，竟然置社稷之險危於不顧，「隱居」於京師近鄰的寧波，閉門不問天下事。面對這許多雷同事件，蒙古人無法欣賞此種儒教，也不會把南宋官員放在眼裏。

南宋官員的投降和隱退使蒙古人不欲再開科舉，亦不願以朱熹學派的標準來施教。後來蒙古人開放科舉和儒教，亦只引用很少數的南方學人，而且並未授與權柄。換言之，南方智士之效力於鄉士者皆透過民間關係，官府之途不得預焉。

在蒙古統治下，比較實際的事業多見進步——治理黃河頗有績效，大運河復能運輸貢物，海上交通貿易遠近。學術及與學術有關的活動則多發展於醫學、數學、繪畫、戲劇和白話小說。這些都不是典型的南宋儒家所專長。在蒙古政府許可之下，也編撰學術巨構——經世大典——其中依然沒有南宋士人所著重的玄學、道德論和倫理學。

對蒙古人而言，經世治國只是遙遠的理想，實際政治與它沾不上邊。元代多亂事，長江下游大規模的造反尤其層出不窮。蒙古人所以不能治理這一片水鄉沃野，一方面是因為當地經濟情況十分複雜，另一方面也牽涉到當地複雜的政治環境和學術背景。

對付叛變，蒙古人一向用兵鎮壓。為什麼他們不運用政治策略？南宋所使用的綏靖政策是安撫流亡——一方面用兵聲討，一方面收容叛逆於官軍，再用之以伐叛逆。蒙古人也曾招降宋將，何以入主中土之後竟然改弦更張？（筆者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國歷史條，稱這種政策為包含政治。）

此時，許多暴動背後的學理基礎已經變得不是包含政治所能控制。許多南方有知之士為文化尋

根，而回歸到朱熹學派的範疇。科舉沒有出路，士人設館授徒遍於社會之各角落，而儒教和理學得以普及。同時，民間逐漸懷念宋室，民族意識紛紛醒覺，更有宗教信仰所掀起的農民暴動。面臨這般龐雜的紛亂，蒙騎固不足以鎮壓，簡單的策略也莫之奈何。

在蒙古統治之下，中國學術不但沒有什麼進展，可能還構成阻礙學術發展的橫溝。然而，此橫溝中之黑流影響於學術發展方向者，仍然不可忽視。

儒家學說的精華在於南宋背景所產生的朱熹學派。其發展歷經艱辛，初則寄身於私家講學，而後表面上依附於官家的學校和科舉，待蒙騎北逸，遂充沛於公私兩方。然則，若無蒙騎之威脅於前，若無元廷之入主於後，吾人不免疑惑，朱熹學派何以能發展得這麼奇特——內而保守於禮教之防，外而激進於理學之玄。

然則儒學之精義亦不能概括一切。是故，全真教在金代結合儒道；入元後不斷突破於艱苦之中，並納釋道於儒術；到明代其全盛時期遂號稱三教並蓄。

以上諸端乃筆者所重估蒙古在華統治之意義。

編者按：本文作者劉子健教授，貴州省人，早年就學於清華大學及燕京大學，留美多年，執教於史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校。專研宋史，著有：王安石變法（英文本）、歐陽修（中文本）等書，為我國宋史座談會發起人之一。本文大部分論據皆首次披露，其先曾於一九七五年夏，在普林斯頓大學元史研習會中討論並修正。該研習會為美國學術團體總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支助，由杜英學院 (Bowdoin College)的萊羅士教授 (John D. Langlois, Jr.)

宋史研究集 第十四輯

八

主持。

（原刊華學月刊第一一期，民國七十年三月）

南宋浙東的史學

宋 晞

一、前言

我國古代所謂經學，與史學很難區分，「六經皆史」的說法由來已久。司馬遷撰寫史記，明白指出以董仲舒所言春秋大義爲其著書的根本原則，則治史學必旁通哲學、政治學等以爲輔助。張蔭麟先生曾說，宋以後的浙東學者，皆兼治哲學與史學。（註一）他所指的哲學，實即經學。錢賓四先生說：「中國古代之文學與史學，皆通學，非專門之學。非可如後人觀念，專以文學或史學視之。」（註二）他舉詩經爲例來說明這一觀點。綜上所論，古代學者研治經學，實與文學、史學等兼籌而融通。文史哲三者關係密切，古今皆然。

宋代學者治經學，異乎漢唐，不重章句注疏，而講求義理。北宋初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闡揚春秋尊王之義；北宋末胡安國撰春秋傳，復明春秋復仇攘夷之義，則尊王攘夷爲春秋要旨。獲孫、胡二氏爲之發揮，對兩宋的言論與政治影響頗大。（註三）

宋代在右文政策下，加上印刷業的發達，且承襲唐代注重修史的餘緒，史學特別發達，人才輩出。以北宋而言，歐陽修之修新唐書、新五代史，發揮義理精神；司馬光之修資治通鑑，雖爲通史性質，亦特別強調殷鑑的作用。宋室南渡，在國土益蹙、強敵壓境的情況下，學術研究不免受其影響。南宋「兩浙爲畿內」，文化中心已由洛、汴間移向東南沿海，另一中心則爲巴蜀。南宋浙東學

者輩出，史學研究之趨向已由北宋的注重義理而到南宋的由性理之學轉向經世事功之學了。

宋代的兩浙東路即今日浙江省的浙東部分，包括寧、紹、台、金、衢、溫、處等七府（嚴州屬兩浙西路）。茲就南宋史學家之籍貫與交誼，分爲婺州（今金華）、溫州（今永嘉）與寧紹（今寧波與紹興）等三大中心，析述如次。

二、金華地區

（一）呂祖謙

婺州在南宋，文風鼎盛，學者中以呂祖謙（西元一二三六—一二八一）爲翹楚。他如陳亮、唐仲友等亦長於史學。呂祖謙，字伯恭，祖上世居東萊，曾祖呂好問，被高宗封爲東萊郡侯，從祖呂本中，號東萊先生。後人以小東萊稱祖謙。宋室南渡，呂氏一族，初定居武林，祖父弼中，遷居婺州（今金華）。祖謙早年任職史館多年，嫻於史學。他說：「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註四）尙書乃三代之史，故祖謙以爲「觀史先自書始」，即取其「理足以牖民，事足以弼化」。至於左傳，所載皆春秋時事。春秋主於記事，雖名爲六經之一，實即春秋之史。祖謙雖以經學爲理學，然又以詩篇爲周史，此即其「經敘理、史載事」之觀點。祖謙嫻於左傳，著有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左傳類編、春秋講義、春秋集解、左氏傳說二十卷、左氏傳續說十二卷等。其他著作有呂東萊先生文集、別集、外集及書說等，其中之表、笱子、策問、史說及讀史綱目等，皆富史學識見，而奉旨編纂宋文鑑（初稱聖宋文海，一百五十卷）一書，分六十一門，保存